

山西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考

——“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例证

李裕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Lidu Yi(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艺术与艺术史系 助理教授)

一 调查缘起

大佛山摩崖造像位于山西省高平市米山镇张壁村西北大佛山山腰。地理位置为北纬 $35^{\circ}49'28.8''$,东经 $113^{\circ}02'46.69''$,海拔1045米。这处摩崖在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1],其造像样式和题材都表现出鲜明的北魏平城时期云冈石窟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鉴于此,我们于2011年11月和2012年7月两次前往实地考察,发现摩崖造像所在之处为一座古代佛寺遗址。寺院依山而建,大体坐北朝南。寺院南部现存用条石垒砌的两层台基,高度5米有余,但不见可供登临的台阶。寺院周围有石砌围墙环绕。在寺院中心略靠北的位置耸立着一块片状巨石,其南北两面均雕刻龕像。此处地势较寺院内南部高出约1米,且在巨石南面约3米处发现条石垒砌的台基遗迹。据此,这里应是寺内大殿遗址,摩崖造像即为殿内所供奉。其他区域为树林和灌木所掩盖。据现场观察,遗址内有近年来被不法人员盗挖而形成的土坑,周围散布的瓦砾和残石雕刻大都属于明清时期的遗物,故可推测大殿遗址约为明代所建^[2]。

考察期间,我们走访张壁村村民,了解到在

20世纪90年代,摩崖正面下龕内佛首和西侧菩萨头被盗凿,现下落不明。但从村民手中觅得造像被盗前照片两张^[3],展现了造像的原貌。下面就大佛山摩崖造像的雕造年代、造像题材及其所反映的云冈模式南传等问题略作研讨。

二 摩崖造像的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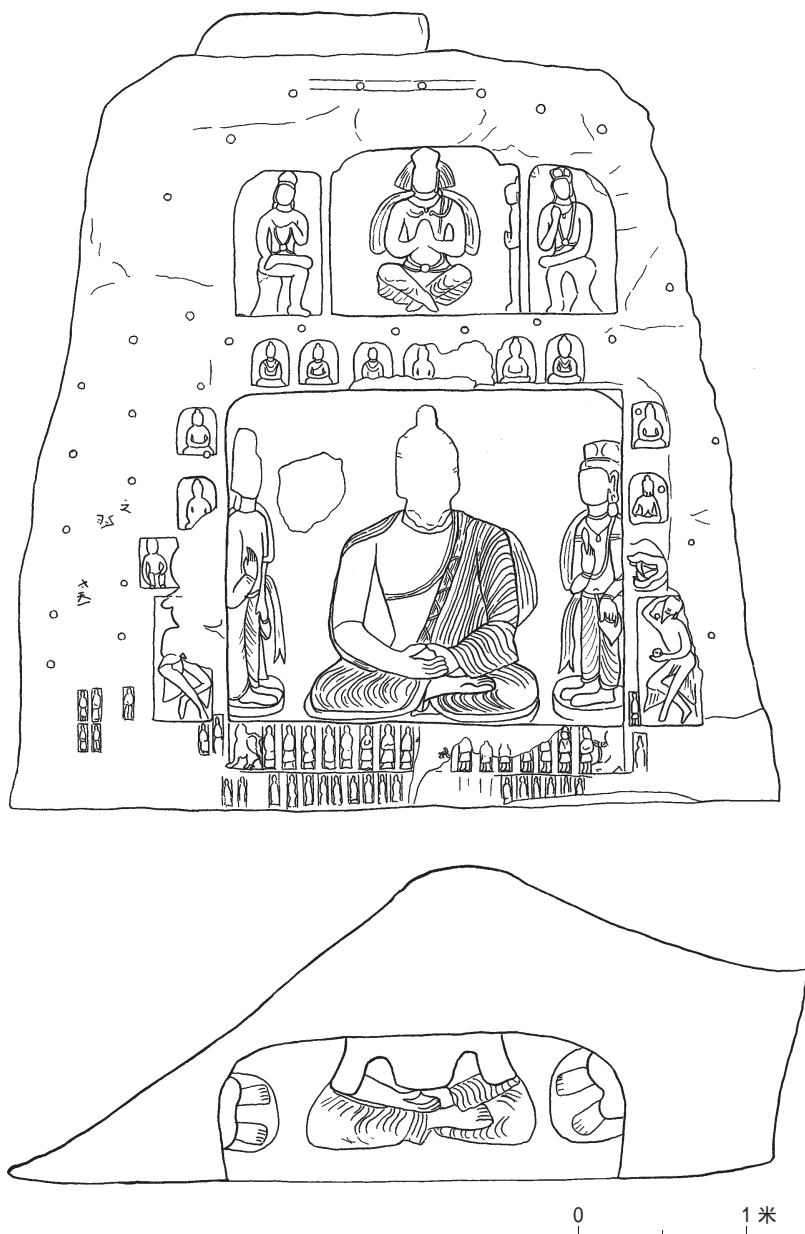
造像所在巨石南面宽4.5、北面宽4.75、东面厚1.2、西面厚0.05、中心最厚处1.9、顶距现在地面4.8米。巨石前倾,倾角达 7° ,其平截面形似石磬(图一)。正面(南)为北魏龕像,背面(北)为明代续凿的龕像。

1. 正面龕像

正面为整体布局。上、下各开一个大龕(图三、四)。

下龕高2、宽2.3、深0.85米。龕内正壁雕一坐佛;东、西两壁各雕一胁侍菩萨立像。

佛像坐高1.9、肩宽0.93米。头被盗,凿痕高0.52、肩至龕底高1.28米。据旧图片,佛首上为馒头状高肉髻,漩涡纹发式,发际分叉。头低垂,面相浑圆,脸颊略宽,下颌丰满。长眉大眼,眼珠凿成一圆孔,目光下视。鼻梁较高,嘴角上翘,面露微笑(图二)。颈部较粗,肩宽腰细,身体硕壮。内着僧祇支,僧祇支有两条突起的



图一 造像正立面及俯视图



图二 正面下龕佛头像和西側菩薩头像(被盜前)

衣边；外披袒右式袈裟，左臂外侧有袈裟衣边，右肩敷搭偏衫，偏衫沿右臂外侧下垂，压在右小臂下。袈裟衣纹细密，突起而厚重，宽衣边上刻有Z形衣纹，下摆短。双肩微微下斜。双手置于腹前，拇指相抵，手背朝外，右手在左手外侧，施禅定印。双膝宽1.33米，左腿压右腿，露右足，结跏趺坐于龕底，无佛座。佛像头后壁面有后世多次彩绘的头光。佛像与右侧菩萨之间有一小洞，洞壁很薄，大概是由于背面雕凿造像时，不慎将壁面凿穿而形成的(图一一)。

东侧菩萨高1.58米。保存完好。头部比例大，头戴高冠，冠正面和两侧面均饰一圆壁装饰，下有冠箍，冠两侧扎宝缯，宝缯外撇，并下垂及肩。一条裂缝从冠右侧经发髻斜向左耳处。头梳发髻，刻出疏朗的发丝。面相长圆丰满，弯眉大眼，眼部有后世镶嵌的黑琉璃珠，但与原刻眼睛明显错位。嘴角微上翘，面露笑容。双耳外侈，耳垂上挂穗状耳铛(图五)。颈部较粗，颈下以阴线刻出桃尖形项圈和一串圆环形璎珞，璎珞垂至肚脐之上。上身袒露，双肩宽厚圆润，以阴线刻出双环臂钏和三环手镯。腰稍细，刻出肚脐。披巾在肩上竖起，沿着双臂外侧绕双肘下垂，披巾的尾端呈双尖状。左手下垂于左腿处，手持一锁状物；右手上举于右胸下部，握一莲蕾。下身略短，着长裙，腹部有窄裙腰。可看出裙子为一块布，由后向前紧裹下身，左右裙边于双腿间相叠压，右裙边在外，刻出Z形衣纹。右裙边上部从里侧绕过裙腰，再外翻至左腹部。裙子阴刻细密衣纹，衣纹由腹下部中心向两侧斜下雕刻，下摆呈锐角状展开。裙下露出双足，稍分开，立于素面圆形座上。座高0.09、直径0.44米。菩萨头后壁面有后世所绘头光(图六)。

西侧菩萨高1.68米。头被盗，凿痕高0.45、宽0.28米。据旧图片，菩萨冠式、面相、五官与东侧菩萨相同。壁面残留外撇的宝缯。双耳垂上挂穗状耳铛。身体表面略有剥蚀，颈部较粗，颈下隐约可见阴线刻的桃尖形项圈和一串圆环形璎珞，左臂可见双环臂钏，右臂臂钏和双

手镯均已不清。披巾、形体、手势及下裙同东侧菩萨。左手下垂于左腿处，手持一锁状物；右手上举于右胸下部，似握莲蕾，但已漫漶不清。裙下露出双足，立于素面圆形座上。座高0.06、直径0.3米。菩萨头后壁面也有后世所绘头光(图七)。

龕外两侧上部各凿2个圆拱形小龕，上下排列，高0.3、宽0.22米。龕内各雕一尊坐佛，均结跏趺坐，服饰风化不清，双手施禅定印。其中东侧下龕内为释迦苦修像，高肉髻，面残，双耳垂肩，颈部青筋突起，上身袒露，瘦骨嶙峋，细腰，腹部内凹呈倒V形。

龕外两侧下部各雕一婆罗门像龕。

东侧龕高0.76、宽0.38、深0.09米。东侧龕边残，龕内雕一婆罗门像，保存较好，高0.74米。头偏向东侧，眼睛以上部分残，窄鼻大嘴，下颌有山羊长须，细颈。身体纤瘦，上身前倾。右臂上举，手摸头顶；左手横置于腹前，手捧骷髅头。上身袒露，下身后腰系短裙，前遮羞处，后面裙摆呈锐角状。双腿裸露，左腿直伸向前，右腿弯曲向后，双小腿交叉，足尖踮起。龕上方雕一龙头，残存嘴部，张嘴露齿(图八)。

西侧龕高0.74、宽0.34、深0.1米。龕内婆罗门像上身残，从残迹看，原像高与东侧像基本一致。头束长发髻，仰面朝向佛龕，上身前倾。现存裸露的双腿。左腿弯曲向后，右腿直伸向前，双小腿交叉，足尖踮起。双腿两侧有呈锐角状的裙摆。龕上方雕一龙头，已残。龙头西侧有小龕，内雕一世俗人物像，头部较大，面部风化不清，右手抱小腿下部，蹲姿。

上龕在下龕上方0.47米处，可分为三部分，即主龕和两侧附龕。由于龕外崖面大面积剥落，龕楣几乎无存。现龕上有修补时留下的小圆孔，圆孔间残留有两道水平的阴刻线条，同时主龕内东侧胁侍菩萨像上方残留有呈钝角的转角，二附龕顶均向内呈半弧状。故可推测上龕曾有一较大的拱形龕楣，两道阴刻线条即为楣拱上缘的边框。主龕与附龕间各有一立柱，用于支撑龕楣(图一二)。

主龕高1、宽1.1、深0.3米。龕内正壁雕

一交脚弥勒菩萨像；东、西两壁各雕一胁侍菩萨立像。

弥勒像高1米。头戴高宝冠，头两侧有三角状的宝缙。面部已毁，双耳尚存，耳垂挂穗状耳铛。颈短，颈下戴项圈。胸部垂挂双蛇形装饰，披巾在双肩上竖起，由头后前绕双臂外侧下垂，再搭于双肘。双肩上佩挂瓔珞，瓔珞由连珠串连，垂于腹部，交接于圆形花饰上，再绕向身后。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衣纹细密厚重。右小臂及双手均残，从残迹看，双手原应拱于胸前。裙下露出双足，交脚坐姿，不雕佛座。

东侧胁侍菩萨高0.65米。头戴高冠，面相长圆，五官已不清晰。身着通肩袈裟，袈裟下摆紧贴下身。身体瘦长，双手合十，笔直站立。

西侧胁侍菩萨像已毁。

两侧附龕各雕一半跏趺菩萨像。

东侧龕高0.87、宽0.53、深0.15米。菩萨坐高0.87米。头微微偏向西侧，戴高宝冠，面相浑圆，长眉，眼睛略鼓，窄鼻小嘴，双耳戴穗状耳铛。颈短，颈下戴桃尖形项圈。双肩上佩挂瓔珞，瓔珞垂于腹部，交接于圆形花饰上，再绕向身后。上身袒露，下身剥蚀严重，裙子已不清。左手搭在左脚上；右手上举于右肩处。双腿风化严重，左腿架在右腿上，右腿下垂，半跏趺坐于束腰座上(图九)。

西侧龕高宽与东侧龕相同。菩萨坐高0.87米。头微微偏向东侧，戴高宝冠，面相浑圆，长眉，眼睛略鼓，窄鼻小嘴，双耳戴穗状耳铛。颈短，胸部剥蚀严重，项圈已毁。身上佩挂瓔珞，瓔珞与东侧菩萨相同，呈X形。上身袒露，下身着裙。左臂上举，手残；右手搭在左腿上。左腿架在右腿上，右腿下垂，半跏趺坐于束腰座上(图一〇)。

上下龕之间雕一排7个圆拱形小龕，每龕内雕一坐佛，身着通肩袈裟或袒右式袈裟，两者相间排列。皆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其中东起第3龕佛像已毁。

下龕之下雕上、下两排世俗供养人。

上排供养人高0.27米，以佛像中线为界，东侧(左侧)为男供养人，西侧为女供养人，均

刻有供养人名字。男女供养人之间岩石剥落严重，在靠近男供养人一侧可见忍冬纹，故而推测此处可能是供养佛像的博山炉。男女供养人外侧各雕一狮子，风化严重，其中西侧狮子身体朝向西侧蹲踞，回首。男供养人共7身，其中东侧2身保存较好。头戴圆顶垂裙帽，身着交领窄袖长袍，袖手，下身穿着窄口裤(图一三)。其他风化严重。题名从西向东为：(1)“□侍佛时”；(2)“侍佛时”；(3)已风化不清；(4)已剥落；(5)“□□□佛时”；(6)“(唯)那张安兴侍佛时”；(7)“邑子张□侍佛时”。女供养人共8身，身着交领窄袖长袍，袖手，下身穿着裙(图一四)。题名从东向西为：(1)“唯那申屠暈侍佛时”；(2)“唯那□□□侍佛时”，名字处被人工磨掉；(3)“唯那□□□侍佛时”，名字处被人工磨掉；(4)“足侍佛时”，名字处被人工磨掉；(5)“唯那吝思男侍佛时”；(6)“□周玉侍佛时”；(7)已不存；(8)“□□□玉胜侍佛时”。

下排供养人形体较小，高0.18米。与上排相同，东侧(左侧)为男供养人，西侧为女供养人。男供养人有8身以上，但风化严重，题名仅可见“邑子”。女供养人共10身，题名从东向西为：(1)“唯那杨□□侍佛”；(2)“唯那齐□□侍佛□”；(3)“邑子王父□侍佛□”；(4)“周”；(5)“郭□□侍佛时”；(6)“和合(?)奎侍□□”；(7)“王女□侍佛□”；(8)“□□□侍佛时”；(9)已风化不清；(10)“□□□侍佛□”。

东侧婆罗门龕西侧下方雕刻2身男供养人，上下排列。上方供养人题名为“□□张□□□”；下方供养人题名为“邑子张益(?)侍佛”。

西侧婆罗门龕之西雕刻5身男供养人，上3身，下2身，均身着窄袖长袍，袖手，下着窄口裤。上排中间供养人有题名“邑子张问侍佛”，西侧供养人题名不清。下排东侧供养人题名为“邑子张炙侍佛”。西侧供养人题名为“□□□辰侍佛”。此龕东侧下方也雕刻4身男供养人，东侧第一身最高，其东题名为“唯那□□”。

崖面西部还残留有3行竖书的文字残迹，可能是发愿文，但因崖面剥蚀严重，已经无法



图三 摩崖造像



图四 摩崖造像正面



图五 正面下龕东侧菩萨像头部



图六 正面下龕东侧菩萨像



图七 正面下龕西侧菩萨像



图八 正面下龕东侧婆罗门像



图九 正面上龕东侧半跏菩萨像



图一〇 正面上龕西侧半跏菩萨像

图一一
正面下龕佛和菩薩像



图一二
正面上龕彌勒和菩薩像



图一三
下龕下东侧男供养人





图一四
下龕下西侧女供养人

辨识。

2. 背面龕像

整个崖面为一组明代雕造的龕像(图一五)。

正中距现地面1米高处雕观音骑犼像,通高2米。观音坐高1米,头被盗。身着双领下垂式上衣,右袖挽起。下身着裙,有裙边。右手搭在右膝盖上,左手下垂,手掌撑在座上。右腿曲置于座上,左腿下垂,足下踩一莲台,游戏坐于仰莲座上,座下为犼。犼长1.24米。头东尾西,头扬起,圆眼宽鼻,露齿,回首仰望观音菩萨。犼颈部刻有缕缕鬃毛,背部覆华丽的座垫,座

垫前方有宽带,系套在犼颈上。臀部有残缺,四肢前伸,作卧状(图一六)。

犼两侧各雕一世俗装束的立像。东侧立像为龙女,高0.62米,头被盗,身着广袖大衣,双手于胸前捧一供盘。衣下露出双足,着履,立于仰莲台上。莲台高0.4米。西侧立像为善财童子,高0.62米,头被盗,身着无袖对襟长衣,下身着裤。双手拱于胸前,手残,似合十。裤下露出双足,立于仰莲台上。莲台高0.4米。

观音两侧各雕一天人。东侧天人像整体被盗,可见双足及足下所踩云头座残迹。西侧天



图一五 摩崖造像背面



图一六 背面半跏观音像

人像高 0.6 米。头部上方有一朵浮云，头部及上身剥蚀严重，似裸上身，下身着短裙。左手上举，右手下垂，作用力状。裙下露出双足，立于云头座上。座高 0.37 米。

两侧天人之外侧及观音上方各凿一龕。

上龕，顶残，残高 0.75、宽 0.9 米。龕内雕一佛坐像，高 0.75 米。头残，残破处有两个孔，系后来修补的痕迹。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双手置于腹前，施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莲瓣只有轮廓，未雕完。

东侧龕高 0.8、宽 0.85 米。龕内雕一罗汉和一世俗人物像。罗汉像高 0.65 米。头被盗，身着交领大衣，袖手，双手置于双腿上，衣下露出小腿下部，结跏趺坐。罗汉像西侧为一世俗装束的立像，高 0.54 米。头被盗，左臂残，身着广袖长袍，双手置于胸前，似持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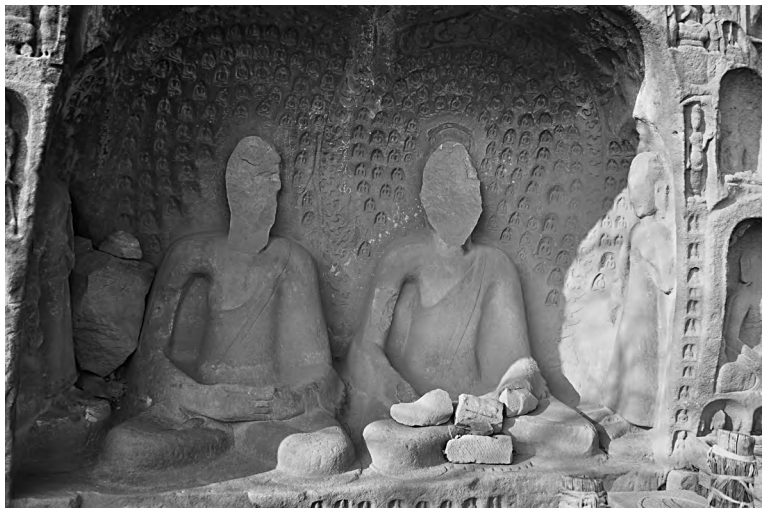
西侧龕高 0.9、宽 0.75 米。龕内雕一大肚弥勒像，高 0.65 米。头被盗，身披袈裟，袒胸露怀，大腹便便，雕出肚脐。左手置左腿上，掌心向上；右手臂残。左腿盘屈，右腿竖起，半跏趺坐。

三 相关问题的讨论

背面摩崖为明代雕造的一组龕像，学术价值较小，此不赘述。下面主要讨论正面造像的相关问题。

1. 造像样式与雕造年代

正面造像龕西侧疑似发愿文的文字已无法辨识，也无相关历史文献和方志的记载可供



图一七 山西高平羊头山释迦多宝龕



图一八 山西高平建宁乡北魏太和二十年四面造像碑

参考，但造像所显示的时代特征十分显著。

首先，从造像样式看，佛和菩萨像均面相丰满，身体硕壮。佛像双肩宽厚，腰部稍细，身着袒右式袈裟，衣纹厚重，衣褶突起，其特点与云冈第二期稍早阶段造像一致。如云冈第 7、8 窟，第 9、10 窟佛和菩萨造像，皆与此相似。尤其是佛像直接坐在龕底，不施佛座的做法也与云冈第二期稍早阶段洞窟一致。如第 7、8 窟佛像身下大部分没有佛座，到了略晚的第 9、10 窟雕造时佛像则多坐在须弥座上。又如菩萨像头戴

高冠,冠上正面和左右各有一圆璧形装饰,戴穗状耳铛,披巾在肩上竖起,身披圆环或X形的璎珞,这些也是云冈第二期稍早阶段菩萨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交脚弥勒菩萨的双蛇形胸饰,主要流行于云冈第一期和第二期稍早阶段,如云冈第17窟主尊弥勒菩萨大像,第7、8窟与第9、10窟弥勒菩萨像。云冈诸窟胁侍菩萨像一般没有这样的装饰,这一点二者也是相同的。因此,大佛山造像明显具有云冈第二期稍早阶段造像的特征,其雕造年代也应相差不多。

其次,从造像题材分析,大佛山摩崖为上下龕组合:下龕为圆拱龕,内雕释迦;上龕为楣拱龕,内雕弥勒菩萨及二半跏思惟菩萨。释迦与弥勒的组合形式以及半跏思惟菩萨作为弥勒菩萨的胁侍,均是云冈第7、8窟与第9、10窟所流行的题材。虽然大佛山楣拱龕的龕楣已经风化不清,但龕内雕弥勒菩萨像则是云冈第二期洞窟常见的表现形式,象征着弥勒菩萨所在的兜率天宫。另外,下龕两侧一对婆罗门像特别引人注目。其中有手捧骷髅头者,此题材在云冈第9窟和第12窟就有实例,但不见于龙门、巩县石窟北魏洞窟中。因此,大佛山摩崖的造像题材与云冈第二期稍早阶段洞窟的题材基本一致,表明雕造年代也大体相当。

再从供养人服饰看,头戴圆顶垂裙高帽,身着交领窄袖长袍,下身着裤,此为常见的鲜卑胡服。北魏孝文帝推行服制改革始于太和十年(486年),至十八年(494年)全面禁止鲜卑服^[4]。服制改革曾引起了云冈造像样式的巨变,如云冈第二阶段稍晚开凿的第5、6窟以及第1、2窟佛像均出现汉式褒衣博带式袈裟。据此,世俗供养人所着鲜卑服饰当是服制改革前的着装样式,其年代可能接近甚至早于太和十年(486年)。

云冈第二期稍早阶段洞窟包括第7、8窟,第9、10窟和第11、12、13窟。宿白先生曾根据金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所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所述护国、崇教二寺的推定,排列出第二期洞窟开凿的先后次序:云冈第7、8窟开凿年代最早,约完成于孝文帝初期。

第9、10窟略晚于第7、8窟,为钳耳庆时开凿的“太和八年(484年)建,十三年(489年)毕”的洞窟。第11、12、13窟则接近于第9、10窟^[5]。

据此,我们推断摩崖造像龕的雕造年代约相当于云冈第7、8窟和第9、10窟,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前期(477~489年)。

2. 构图形式与造像题材

整个壁面的龕像是统一设计和雕造的。下龕圆拱龕内雕释迦坐佛,上龕楣拱龕内雕交脚弥勒菩萨与二半跏思惟菩萨像。两龕之间为七佛小龕。下龕两侧上部为四佛小龕;下部各有一婆罗门像龕。下龕之下雕成排的世俗供养人礼佛行列。

正如前述,上下龕有着内在的联系,构成上下的题材组合,即释迦与弥勒菩萨。这与云冈第二期洞窟正壁主尊龕像的构成一致,如云冈第7、8窟主室正壁也为上下龕配置。其中第8窟上龕倚坐佛,二交脚弥勒菩萨二半跏菩萨,下龕释迦坐佛。第7窟上龕交脚弥勒菩萨二倚坐佛,龕内侧壁二半跏菩萨,下龕释迦多宝。弥勒像应为南朝宋时沮渠京声所译《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所言的弥勒在兜率天宫敷演说法、为众生释疑之像^[6]。这是十六国北凉和北魏时期流行的主要题材之一;二半跏思惟像应为太子冥思悟道的形象,即太子思惟像,在云冈往往作为弥勒菩萨的胁侍出现,如云冈第10窟主室正壁主尊为交脚弥勒菩萨大像(造像已毁,残留菩萨外形),两侧原为半跏思惟菩萨(其中西侧半跏像在明清时期改为菩萨立像)。《魏书·释老志》记载:“所谓佛者,本号释迦文者,译言能仁,谓德充道备,堪济万物也。释迦前有六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文言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而降世。”^[7]显然现在世的释迦和未来世的弥勒作为主尊是礼拜供养的中心。两龕之间小龕表现过去七佛,与主尊相配合,组成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佛。

下龕两侧上部四佛小龕中东侧下龕为释迦苦修像。四佛图像的构成不易解读。不过在云冈第12窟前室南壁立柱上方也雕刻有四尊坐佛像,其中东起第二尊为释迦苦修像^[8]。按照

佛传类经典的记载:释迦曾经离家在山中苦修六年,形体羸瘦,知苦行并不能求得解脱之道,于是放弃苦行,在尼连禅河洗净污垢,受牧女所供乳糜后,恢复体力,来到菩提树下成就正觉^[9]。因此,释迦苦修像的出现似在告诫广大信众,苦行只能摧残身体,不能求得正道。

下龕两侧下部二婆罗门像,东侧婆罗门手持骷髅头;西侧婆罗门上身残,手持物不明。成对出现的婆罗门像始见于云冈第二期洞窟,如云冈第9窟明窗两侧的显要位置就雕刻二婆罗门像。西侧婆罗门右手持骷髅头,左手食指向前指;东侧婆罗门左手持鸟,右手放在额头上^[10]。第12窟前廊西壁上层窟顶南侧龕坐佛两侧也各有一婆罗门像,其中佛右侧婆罗门右手持骷髅头,左手摸左耳;左侧婆罗门左手持鸟,右手前伸^[11]。云冈第19窟前壁第二期续凿的释迦多宝龕两侧有形体相对较小的婆罗门像,龕左侧者右手持骷髅头,半跏趺坐;龕右侧者左手持鸟,站立^[12]。上述婆罗门像与大佛山造像十分相似,均头束高髻,须髯下垂,瘦骨嶙峋,袒露上身,着短裤,惟云冈婆罗门主要是半跏坐于束帛座上。此题材不见于龙门、巩县石窟,但在敦煌莫高窟较为流行,如第254窟北魏洞窟中心柱东向正龕交脚佛的南侧绘婆薮仙;北侧绘鹿头梵志^[13]。二婆罗门均为侧身双腿一前一后分开式的立姿,足尖踮起。其姿态与大佛山一致。据此,大佛山下龕西侧所毁者应为持鸟之婆罗门像。

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认为:云冈第9窟手持骷髅者当为昙曜所译《付法藏因缘传》卷六所讲的卖骷髅仙人因缘故事^[14],但对持鸟者并没有作出解释^[15]。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手持骷髅者为鹿头梵志,手持鸟者为婆薮仙人^[16]。

鹿头梵志见于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所译《增壹阿含经》卷二〇《声闻品》,说鹿头梵志“明于星宿,又兼医药,能疗治众病,皆解诸趣,亦复能知人死因缘”。释迦世尊取死人髑髅授与梵志,让其辨别男女、因何命终及轮回何处,梵志反复观察,以手叩之,如此往复,皆能辨之。但叩优陀延罗汉髑髅却不知其所以,

释迦为他解释如来正法断生死轮回之奇妙,是时“梵志即得出家学道,在闲静之处,思惟道术……即成阿罗汉”^[17]。婆薮仙,又作婆薮、婆薮缚斯。据后秦龟兹国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大智度论》卷三《初品中·住王舍城释论》记载:婆薮仙为摩揭陀国王,后出家为仙人,主张婆罗门法天祀中杀生啖肉,后堕入地狱;复经佛之教诫,始归三宝^[18]。王惠民则对持鸟者为婆薮仙人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佛典中记载的婆薮仙人并无持鸟的内容,此形象应该是尼乾子^[19]。不过,该文所据外道持雀的佛典依据是唐玄奘所译《俱舍论》以及玄奘弟子普光《俱舍论记》,缺少充分的证据,还不能作为定论。但不管何种解释,二婆罗门像表现的是外道皈依佛法的因缘故事。

总之,大佛山摩崖造像的图像构成,旨在宣扬佛法传承有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皆有佛陀治世,且威力无穷,能使外道皈依。同时,修行佛法无需苦行。

3. 云冈模式与工匠的南下

大佛山摩崖造像龕的男性功德主均为张姓,有“唯那”和“邑子”的不同身份,并无任何官职;可以辨认的女性供养人有郭、王等姓氏,身份也有“唯那”和“邑子”。从男女供养人对称布局的排列方式,可以确认她们应该是张姓家族的妻女眷属。因此,这些供养人属于当地张姓家族组成的民间邑社组织,由他们共同出资开凿了这一组大型摩崖龕像。

大佛山摩崖造像与云冈第二期偏早阶段的洞窟造像有着惊人的相似,无论是题材布局,还是造像样式都如出一辙。这是高平地区首次发现与云冈如此类同的摩崖造像。从表面上看,云冈模式南下影响到了高平地区是毫无疑问的,但更重要的是涉及到工匠的身份或来源问题。

在高平地区还有北魏孝文帝太和后期开凿的石窟造像,如高平羊头山石窟的大型释迦多宝龕^[20]和高平建宁乡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邑子等为皇帝陛下造石像”四面造像碑。这些佛像和菩萨像虽然保留了云冈第一、二期造像的旧样式,但与大佛山摩崖造像相比差异显

著,如佛像袒右式的袈裟一般不施衣纹,也无Z形袈裟衣边(图一七)。佛和菩萨的形体略显丰满,但脸庞明显偏瘦长,肌体也不如大佛山造像那样丰满圆润(图一八),而且雕刻手法和技艺显得十分稚拙。这种差异性似乎暗示着两者出自不同的工匠之手。后者显然属于当地民间工匠所为,而前者则是非常熟悉云冈石窟造像样式和题材的工匠所为。由此,我们认为雕造大佛山摩崖龕像的工匠极有可能来自于平城,并且曾经参与过云冈石窟的开凿。

云冈石窟始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是在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集聚了各地大量财富、人力和百工技巧的背景下,由沙门统昙曜主持雕造的。云冈石窟是在融汇了东西方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被学术界称为“云冈模式”^[21]。云冈大规模的雕造活动,从设计到施工,必然有严密的组织管理机构 and 工匠集团来实施。可以想见,通过20余年的开凿,应该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雕刻工匠,积累了丰富的佛教图像资料。一般认为,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年)南迁洛阳后,云冈规模宏大的皇家洞窟开凿活动就此中止,随着洛阳龙门石窟的开凿,可以推测有相当数量的工匠南迁到洛阳。但从大佛山摩崖造像来看,这种情况可能在迁都前就已开始,尽管那时工匠南迁或属个别现象,却对当地石窟寺的开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高平市位于山西省晋东南地区,北邻长治,南接晋城,居上党盆地的中心位置。在南北朝时期,高平是晋东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是连接平城和洛阳重要的交通纽带。《魏书·地形志上》记载:“建州,慕容永分上党置建兴郡,真君九年省,和平五年复,永安中罢郡置州,治高都城。领郡四、县十,户一万八千九百四,口七万五千三百。”^[22]建州所辖高都(今晋城)、长平(今高平)、安平(包括今沁水、阳城)、泰宁四郡(包括今沁心、阳城),范围并不大,但人口密集。州治高都城(今晋城市北高都镇)位于晋城和高平之间。长平郡所属高平(治高平城)、玄氏(治玄氏城)二县,位于高平市东侧境内。三座城均在古代

交通干线上。大佛山摩崖造像是建州境内开凿年代最早的,由此带动了当地开窟造像活动的兴盛。北朝石窟主要集中在高平市境内,比较重要的有北魏时期开凿的羊头山石窟、石堂会石窟^[23]、七佛山石窟,东魏开凿的高庙山石窟等^[24]。因此,云冈工匠的迁移及其对当地开窟造像的影响,是研究北魏石窟造像时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

- [1] 山西省文物局编《厚重山西——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选编》,第202~203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 [2] (清)知高平县事龙汝霖纂辑《同治·高平县志》卷一“地理条”,第6页,东北七里图中明确标示张壁村北有大佛山。但关于大佛山寺院的情况,则没有明确记载。大佛山之名或因山上有大佛像而得名。
- [3] 2012年7月我们第二次考察时走访了张壁村,佛头被盗的具体时间已无法查考,但村民提供了被盗前的照片两张。
- [4] 《魏书》卷七《高祖纪》记载,太和“十年(486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衮冕……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第161页,中华书局,1974年;《资治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记载,建武元年(即太和十八年,494年),“魏主欲变易旧风,(十一月)壬寅,诏禁士民胡服。国人多不悦”,第4370页,中华书局,1956年。
- [5] 宿白《云冈石窟分期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第11窟开凿工程曾经中止,窟内东壁上部有太和七年(483年)续造的龕像。可知,第11窟开凿年代要早于太和七年。
- [6] [日]高楠顺次郎、[日]渡边海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4册,第419页,(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2年,下简称《大正藏》。
- [7] 《魏书》卷一一四,第3027页,中华书局,1974年。
- [8] 参见[日]水野清一、[日]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8、9卷,第12窟图版5,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3年。
- [9] 有关释迦苦行之记载见于(后汉)西域三藏竺大力、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卷五《出家品》(《大正藏》第3册,第469页);(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普曜经》卷五《六年勤苦行品》(《大正藏》第3册,第511页);(南朝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三(《大正藏》第3册,第639页)。后者记载,“尔时太子心自念言:我今日食一麻一米,乃至七日食一麻米,身形消瘦,有若枯

- 木。修于苦行，垂满六年。不得解脱，故知非道”。
- [10] 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图版 6、7，文物出版社，1994 年。
- [11] 同[8]，图版 3、5。
- [12] [日]水野清一、[日]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 13 卷，图版 71A、74，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 年。
- [13] 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一》，图版 27、28，文物出版社，1981 年。图版说明将二婆罗门定为婆薮仙和鹿头梵志。
- [14] 晁曜所译《付法藏因缘传》卷六记载：“又于往昔有婆罗门，持人髑髅其数甚多，诣华氏城遍行街卖。经历多时都无买者，便极瞋恚高声唱言：此城中人若不就我买髑髅者，吾当相为作恶名闻言，汝诸人愚痴闇钝。尔时城中诸优婆塞闻是语已。畏其毁谤，便持钱物至彼买之。即以铜筋贯穿其耳。若彻之者便与多价。其半彻者与价渐少。都不通者全不与直。时婆罗门问优婆塞。我此髑髅皆悉无异。何故价直而有差别。优婆塞言。如前髑髅有通彻者。斯人生时听受妙法。智慧高胜贵其若此。相与多价。其半彻者虽听妙法未善分别。以是因缘与汝少直。全不通者此人往昔都不听法。吾以是故不相与价。时优婆塞持此髑髅。往至城外起塔供养。命终皆得生于天中……此优婆塞以听法人髑髅起塔尚生天上，况能至心听受斯法供养恭敬持经人者。”《大正藏》第 50 册，第 322 页。
- [15] [日]水野清一、[日]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 6 卷，第 17 页，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1 年。
- [16] 谢生保《试论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婆薮仙人和鹿头梵志》，《2000 年敦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 年。
- [17] 《大正藏》第 2 册，第 650~652 页。
- [18] 《大正藏》第 25 册，第 75~76 页。
- [19] 王惠民《执雀外道非婆薮仙》，《敦煌研究》2010 年第 1 期。
- [20] 张庆捷等《山西高平羊头山石窟调查报告》，《考古学报》2000 年第 1 期，第 68~88 页，图版捌 1；图版拾贰 4。图版拾贰 4 所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龛是羊头山开凿年代最早的，可惜的是佛头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被盗。
- [21] 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编《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文物出版社，1994 年。又收入宿白《中国石窟寺研究》，第 114~144 页，文物出版社，1996 年。
- [22] 《魏书》卷一〇六，第 2481~2482 页，中华书局，1974 年。
- [23] 李裕群、衣丽都（即 Lidu Yi）《山西高平石堂会石窟》，《文物》2009 年第 5 期。
- [24] 李裕群《山西高平高庙山石窟的调查与研究》，《考古》1999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刘 婕）

On the Dafoshan Cliff-side Sculptures in Gaoping, Shanxi—An Important Evidence of the Southward Diffusion of the “Yungang Mode”

Li Yuqun

Lidu Yi

The Dafoshan cliff-side sculptures are located in the remains of the main hall of an ancient Buddhist monastery built against the Dafoshan (Mount Huge Buddha) to the northwest of Zhangbi Village in Gaoping City, Shanxi Province. The top of the huge boulder on which the sculptures are located is 4.8 m above the present-day ground. On the obverse (south) of the boulder are the niched Buddhist sculpture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on the reverse (north) are the niched Buddhist sculpture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sculptures on the obverse were sponsored by the local guilds organized by the Zhang Family, the date of which was around the early stage of Taihe Era (477–489 AD)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Xiaowen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style and motifs of the Buddhist sculptures on the obverse of the boulder are clearly adopted from the Yungang Grottoes in the Pingche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hich is significantly meaningful for the researches on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of the Yungang craftsmen.